



## 亲历校长教诲

■ 王凤生

2018年是蒋南翔校长逝世三十周年。在我当学生的时候，他是我可敬的校长，亲耳听他的报告和演讲。在我走上社会参加工作之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我有幸多次面见校长，聆听教诲，令我终生难忘。

校长是年轻人的良师。他1952年12月到清华任校长，在他担任校长6年后的1958年秋季，我进到清华大学水利系读书，从此成为他的一名学生。作为学生，我们都爱听蒋校长的报告，言之有物，针对性强，无套话、废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简短，每次只讲一个问题，一般不超过30分钟，在你还想听的时候，报告结束了。1961年5月4日的晚上，学校在西大操场举办五四青年节纪念晚会，大家散落地聚集在操场上，蒋校长在体育馆看台上做报告。他讲了“红”与“专”的关系问题，鲜明地指出只红不专、只专不红、先专后红、先红后专等说法是不对的，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以往天安门走做比喻，他说：从清华到天安门，天安门是目标，是方向，方向是头等重要的，是政治，去天安门只能朝东南方向走，不能往北走，那要走到清河去了。但光方向对头还到不了天安门，必须实地走才行，否则方向再对，不走还是永远到不了天安门。而且走路的时间

比辨方向的时间要多一些，这就有一个学好业务的问题，是专的问题，所以红专要结合，要又红又专。他也讲到要继承老清华对功课严格要求的传统。这次讲话对于我，不只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在以后的工作中也一直指引着我坚定地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的讲话之所以有力量，首先是内容正确，有道理，能以理服人；其次是针对性强，针对工作的实际或思想状况的实际；最后，他不是居高临下地在教训人，而是一位长者在耐心开导年轻人，是循循善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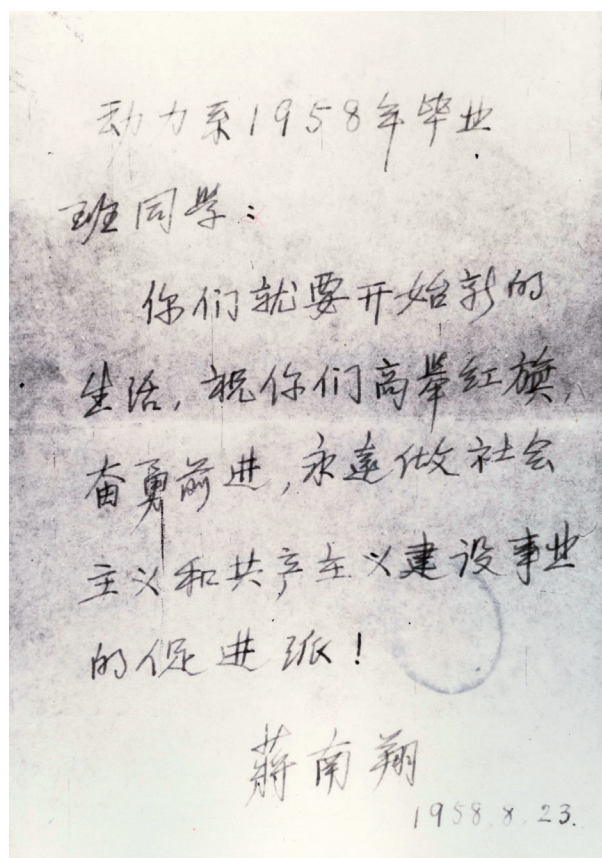
走“又红又专”道路，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是蒋校长终其一生所坚持的，是蒋南翔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整个教育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三支代表队”“双肩挑”等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直到他的晚年，我还不止一次地听到他强调这一点。那是在1987年4月23日下午，即他去世的前一年，我和清华的另两位同事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他对我们说：“‘又红又专’的口号是对的，‘德才兼备’这个口号谁都可以用。现在有只看重业务的倾向，评教授、副教授只看业务。对于教师的评价不能光看业务，不看思想。‘又红又专’的口号有的学校不敢提了。”清华20世纪五六十年

年代的许多毕业生在国家建设的诸多领域和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中坚作用，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与他们在清华读书时学校党委、蒋校长始终坚持“又红又专”的培养方针分不开。

蒋校长是年轻人的良师，不仅体现在他任清华校长期间，在他离开清华，离开教育部，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期间，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都一直关注着青年工作，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1985年，当时我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在那一年10月至12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与蒋校长直接接触就有10余次，当面聆听教诲，受益良多。他推心置腹，语重心长。谈得比较多的是如何引导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加强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强调要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阐述的“又红又专”的要求。他引述邓小平同志的话说：“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他的这些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蒋南翔文集》（下卷）的三篇文章中：《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论在我国大学生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和《继承与发扬“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986年1月，蒋校长在主持全国省级党校校长座谈会期间，突发心脏病住进北京医院接受治疗。此后的时间他大部分是在医院中度过的，直至1988年5月3日去世。在他同病魔做顽强搏斗的同时，他还把大量心血倾注到高等教育，倾注到清华，倾注到年轻一代人的身上。

20世纪80年代，高校中一度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从1980年冬天部分高校学生中的“竞选”风潮，到后来的上街游行，这中间，有的是大学生要表达爱国情感，如“九一八”，提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也有要表达对不良社会现象如腐败、不正之风的不满等，这些是积极的健康的



1958年蒋南翔给毕业生的题词

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够健康的一面，现象的背后反映出部分大学生对于共产党的不信任，对于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动摇了不少青年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信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对青年的不良影响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煽风点火；我们一度在青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27页）。面对这样的情况，怎样通过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既保护年轻人爱国热情，又能实施正确引导，使之不走偏方向，使他们得

以健康的成长，是当时高校面临的严肃而又紧迫的课题。

蒋校长惦记着高等学校，惦记着清华，惦记着年轻的一代人。1985年10月17日清早，他将李传信同志（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我叫去。7:15我和传信同志就到了他北太平庄附近的家里。他尚未用餐，桌上摆放着两小碟咸菜、一个馒头、一小碗稀饭。他边吃边谈，9点我和传信同志赶回到工字厅东厅参加常委扩大会议。这一次谈话，他重点谈学生工作，从1980年“竞选”谈到前不久高校中发生的学生上街游行等事。他说：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我在当教育部长时就和某大学的党委书记谈到过，波兰闹事是团结工会起的头，我国如果闹事，很可能从大学生那里起头。我的谈话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1980年学生“竞选”时，我说学生的事不要压，那会激化矛盾，可以有领导地组织参加“竞选”，用“竞选”来引导“竞选”。清华是艾知生抓的，很成功，选上了好的学生。中央讨论时，我代表教育部汇报了情况，北京市委也汇报了。中央认为教育部的汇报有分析，要转发，后因有的学校反对而未能发成。这次清华学生虽然没有上街，也不要大意，现在不出事，以后也有可能出事。要谨慎，话不要讲满，要多说我们自己也有问题，有许多情况，别的学校存在的，清华同样存在。他严肃地谈了共青团工作，他说，1980年有的大学团员占学生总数93%，“竞选”时宣称自己不是党员，家庭社会关系中也都没有共产党员的人受到鼓掌欢迎，但共产党员候选人都落选了，共青团员没有发挥作用，这怎么行？所以在教育部给中央的汇报材料里，我提了个观点，要整团。有的报刊宣传不利于对青年的教育，是“自伐其木”。潘晓的话（指《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5期刊载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主观为自己，客观

为别人”是为个人主义开脱。对青年要进行集体主义教育，要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线，这条线很重要，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谈话最后，他特别强调地指出，许多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东西不要随便地抛弃，抛弃就是破坏。

1985年，中央指定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蒋南翔同志主持筹备“一二·九”运动50周年的纪念活动。组织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一些老同志与年轻的大学生座谈是若干纪念活动中一次规模较大且很重要的活动。在座谈会召开之前，我参加了10月22日和11月20日两次由南翔同志主持召开的筹备会议，地点均在中南海。11月24-27日，座谈会正式举行，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我在24日座谈会的第四组上发了言。27日下午召开了全体与会人员参加的大会。学校高景德校长、张光斗先生和我参加，清华的学生代表张勤在大会上发言。八十多位当年领导和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首都16所高校120位同学教师出席。薄一波同志的讲话充分肯定了这次座谈会“开得很有意义”。

在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期间，蒋校长还亲自参加了清华的三次纪念活动，一次是11月2日下午在工字厅东厅，他和荣高棠同志与我校学生座谈“一二·九”运动，李传信同志和陈希同志（时任团委书记）参加座谈。第二次是在12月7日下午，在大礼堂召开全校纪念“一二·九”大会，姚依林、蒋南翔、刘达、李锡铭、何东昌、汪家镠等同志到会，李传信同志主持会议。第三次是12月8日，在主楼接待厅和主楼后的青年广场，召开“青年广场”名牌揭幕仪式。当年参加“一二·九”“一二·一”运动的老学长出席了仪式。蒋南翔、郭明秋、方堃、刘达同志为名牌揭幕。

这些活动是在蒋校长的晚年，在他同病魔做顽强拼搏的同时进行的。从中可以看出他是怎样为教育、为清华、为年轻一代呕心沥血、顽强地

工作的。将它们如实地记录下来，发表出来，这是我的责任。否则，也许蒋校长的有关重要谈话和实践活动将永远地尘封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不乐见的。

南翔校长曾在清华园这片土地上读书，从学生运动开始投身革命。他是新清华的首任校长，为社会主义的清华大学呕心沥血、极尽操劳。还是在这片土地上，在非正常的年代，他受到不公平待遇，挨批斗、被“劳改”，直至送进牢监，他“身虽囚，心如旧”（1969年中秋蒋南翔填词《钗头凤》中的两句），坚持真理，逐条批《创办》（1970年四人帮爪牙迟群、谢静宜炮制的全盘否定新中国17年教育工作成就的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他一生情愿做人民的牛。在“拨乱反正”之后，他不计旧怨，不改初衷，依然眷顾着他所熟悉的这片土地，经常呵护，时时提醒，希望为国分忧，担负更多的责任，直到他不得不离开他始终眷顾着的这片土地。他是我们的好校长，他是清华杰出的忠诚的儿子。

蒋南翔同志把清华看得很重很重，对清华始终寄予厚望。他在1960年任教育部副部长后，仍然兼任清华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就是在前面提到的1987年4月23日谈话中，他还谈到：现在清华大学在高等学校中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清华有基础，有条件，要做中流砥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有错误修正错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革”前在清华学习的学生是很宝贵的，清华要留一些这个时期培养的人，相比之下，其作用比去当部长、副部长更重要。可见他对清华的重视。他还谈到，清华要研究马列主义，和自然科学结合，要研究系统论、控制论。他说，我们党现在理论队伍人少，水平也不够高。现在一些人对马列主义没研究，对实际状况也没研究，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他还谈了学哲

学重要等。谈话已经过去26年了，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清华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许多骨干力量，直至培养出国家领导人，充分说明南翔同志重视教育，关心清华，不是为了小团体的利益，更不是为一己私利，完全是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是极富远见的战略考虑。

不跟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做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蒋校长自己是这样做的，也是他经常告诫我们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83年1月28日晚上，在清华主楼接待厅的讲话。那是为纪念清华辅导员制度30周年举行的一次茶话会，除了辅导员、班主任代表参加，蒋南翔、艾知生等老领导也都到会并讲了话，会议是由方惠坚同志主持的。蒋校长讲了昌平沙河上朝宗桥的故事。明朝皇帝为了解决因修建皇陵后造成交通不便的问题，派了两位大臣在沙河上一南一北建两座桥，赵朝宗负责北桥，另一人负责南桥。南桥修建偷工减料，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修了一个豆腐渣工程，当然很快便完工，到皇帝面前“争宠”。而赵朝宗修北桥，用好材料，精心施工，不抢工期，当然完工较迟，花钱也比南桥多，为此受奸臣诬陷，被午门斩首，南桥的奸臣受封官行赏。可几年后的一个夏天，京北大水，南桥冲垮，北桥却屹立不动，皇帝至此才恍然大悟，令人在北桥桥头竖石碑刻上“朝宗桥”三字，以示纪念。现在沙河上的朝宗桥就是四百多年前的北桥。蒋校长以此生动的历史故事为例告诫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党负责，要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的话至今仍萦绕在耳。

蒋校长离开我们已经有了30个年头了，记得他的话，学习他的精神和作风，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作者王凤生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